
战后日本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践及特点^{*}

张建立

内容提要：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是目前政治学、国际政治学、文化研究、传播理论研究等领域都较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战后日本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践过程中，“文化”既被作为一个需要与时俱进保护的对象，亦被用作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这一特点，在对天皇制的保护与对皇室的利用、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吸纳与利用以及对文化软实力的培育与运用等方面均有明显体现。对天皇制的保护与对皇室的利用，发挥了维系日本国家认同感、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作用，但皇室成员减少令天皇制的存续也面临新的危机；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虽已逐渐渗透日本社会，但日本政府实施的所谓“价值观外交”乏善可陈；对文化软实力的培育与运用，无论对内提振民族文化自信还是对外提升日本国家形象，均收效很大。

关键词：国家文化安全 天皇制 日本皇室 价值观 文化软实力

作者简介：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931.3；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25）05-0074-28

谈及日本文化，人们惯常以为日本擅长通过引进、模仿外来文化以塑造自己的文化，16世纪之前主要是引进中国文化，其后则主要引进欧美西方文化。^①日本文化学者石田一良形容这种转型自如的日本文化如同“换装偶人”。^②大概正是因为这种对日本文化的直观感受，大家便总觉得积极汲取外来文化的日本似乎不存在所谓“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而在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国家文化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学术研究热点问题，但学界缺乏对日本国家文化安全的专题研究。就笔者所见，标题含有“日本文化安

* 感谢《日本学刊》编辑部和匿名审读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若有疏漏和不足概由笔者负责。

① 叶渭渠：《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8—441页。

② 石田一良『カミと日本文化』、ぺりかん社、1983年。

全”字样的论文和著作，仅有甘能清和汪静所著《纠结的换装偶人：文化安全视角下的日本文化研究》^①，探讨了日本在维护传统价值观、“伞文化”传承以及应对日语语言危机等方面的经验。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论文检索系统的检索结果来看，日本学界也鲜见以“维护日本国家文化安全”为主题开展的研究，直到21世纪以后才散见一些从保护文化遗产、观光、文明冲突等角度探讨日本文化安全问题的研究成果。^②另外，日本一些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学术团体，如2001年成立的“日本国际文化学会”等，也多旨在探讨如何通过增进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实现多元文化共生。^③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日本面临的国家文化安全形势十分严峻，日本政府也从未停止过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践探索。

一、何谓“国家文化安全”

关于“国家文化安全”，中国学界的探讨可追溯到林宏宇于1999年发表的文章《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该文指出：“国家安全的内涵包括诸多方面的内容，如主权、领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生态等等，它们都对国家安全有很大影响。但人们常常容易忽略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文化安全。文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是深层次的、全方位的、潜移默化的，也是最深刻的。因为受文化影响的是人，而人是保卫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关键因素，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④

随着人们对国家安全问题关注度的提高，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也逐渐成为政治学、国际政治学以及文化研究、传播理论研究等领域的一个学术研究热点。但是，由于该问题存在复杂性，目前中国学界围绕“国家文化安全”这

① 甘能清、汪静：《纠结的换装偶人：文化安全视角下的日本文化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

② 参见：坂井一成「『文化の安全保障』の時代」、<http://www.nippon.com/ja/column/g00329/> [2025-06-27]；石森秀三『2002年度実績報告書 文明の世界秩序の構築と我が国の文化的安全保障』、<https://kaken.nii.ac.jp/ja/report/KAKENHI-PROJECT-14601007/146010072002jiseki/> [2025-06-27]。

③ 平野健一郎「国際文化学への期待」、『インターカルチュラル』2003年第1号、6—17頁。该文是平野健一郎基于其2001年11月10日在龙谷大学瀬田学舍举办的“日本国际文化学会成立纪念研讨会”上所作基调演讲修订而成。

④ 林宏宇：《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国家安全通讯》1999年第8期，第31页。

一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2000 年,石中英发表论文《学校教育与国家文化安全》,称:“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特别是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免遭来自内部或外部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或颠覆。国家文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① 2004 年,石中英又发表论文《论国家文化安全》,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概念进行了更详细的界定。其中提出,广义的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及建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社会基本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知识传统、宗教信仰等主要文化要素免于遭受内外敌对力量侵蚀、破坏和颠覆,具备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协调一致的文化系统,并在人民群众中保持一种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狭义的国家文化安全,则特指主权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基本政治制度、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及国家形象等主要文化要素免于遭受内外敌对力量侵蚀、破坏,从而确保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在其主权范围内、也包括在国际上享有高度一致的合法性认同。^②

从国际政治学的视角看,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其中,传统安全主要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安全互动并把国家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致力于保障主权、领土和利益差异基础上的国家安全;而非传统安全主要指向“跨国家”的安全互动以及国家内部产生的安全威胁,将重点转向超越国家差异的社会和人的安全,以人类维持日常生活、价值和免于匮乏、天灾以及专制的迫害等为最基本的内容和目的。^③ 前述石中英所界定的广义和狭义的国家文化安全,实质上可被视为分别从非传统安全角度与传统安全角度给出的界定。2008 年,韩源在《国家文化安全引论》一文中更加明确地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视角,对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子系统,其实质是国家文化利益安全。从“传统安全”的视角来看,安全的主体及安全威胁的来源都是作为“整体”的民族国家,从这一意义出发所理解的国家文化安全中的“文化”指与不同民族、国家和制度相对应的文化心理、民族精神、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层面的“个性文化”,国家的文化利益与文化主权进而表现为对这种“个性文化”健康发展的维护。因此,“传统安全”视角下的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与

① 石中英:《学校教育与国家文化安全》,《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 年第 11 期,第 11—14 页。

② 石中英:《论国家文化安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3 期,第 5—6 页。

③ 朱锋:《“非传统安全”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4 期,第 139—146 页。

“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相对应的概念。而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来看，国家文化利益还应考虑次国家文化单元的发展状况，如国民的精神文化风貌及民间文化实践活动等，这些文化单元可被统称为“公共文化”，国家文化利益则表现为“公共文化”的总体发展状况与国家发展目标或国家发展需求相一致。概言之，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下的文化包含三个方面，即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公共文化。与此相对应，国家文化安全由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公共文化安全构成。^①

从上述关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代表性观点来看，无论从传统安全视角还是从非传统安全视角来探讨国家文化安全，其所涵盖的基本内容大体是一致的。至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出现的时间，学者们的认识不尽相同。而且，每个国家的国家文化安全的形成和构成皆独具特色，各有其发生和发展的不同规律。从传统安全视角来看，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严格说来，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真正出现和突出表现，只有到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之后，特别是在西方列强对东方国家实施殖民侵略政策、东西方文明冲突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才逐渐成为现实。”^②也有学者进一步附和该观点并指出，在西方国家逐渐形成世界性列强、开始对非西方国家开展大规模殖民活动以前，各大文明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冲突、文明消长和文化变迁，都没有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国家以及民族的重大威胁。^③

随着社会实践不断深入、社会发展不断加速，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也与时俱进地得以发展。尽管如此，当利用这些概念界定来分析战后日本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践时会发现，日本的国家文化安全观与上述概念在内涵上有一定吻合之处，但也存在着很大不同。简言之，中国学界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理解，大都是将其作为一个单纯的传统安全问题或非传统安全问题来对待；而对于战后日本而言，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其所面临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大多需要同时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方面来看待。

另外，中国学界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理解，无论从传统安全视角还是从非传统安全视角，无论单独探讨国家文化安全还是探讨整体国家安全系统内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其讨论的核心都是如何保护其中“文化”的安全。也就是说，尽管近年来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成果越来越注重跨学科研究，但

① 韩源：《国家文化安全引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6期，第90—91页。

② 刘跃进：《国家安全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

③ 潘一禾：《文化安全》，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中国学界大多是从文化主权与利益、文化生存与发展的角度对国家文化安全概念进行界定，对“文化”的理解还基本停留在将其作为被保护对象的层面。例如，作为 202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彭泽明发表了论文《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和外延辨析》。该文指出，自 1999 年国家文化安全概念首次被提出以来，围绕国家文化安全内涵和外延的讨论日益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但截至目前仍存在认识不清晰、不统一的问题：一是没有完整把握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属性，其内涵的宽度、精度需进一步拓展；二是尚未找到与国家文化安全内涵主要内容相对应的外延及科学的划分标准，从而导致其外延不适且外延之间界限交叉。最终文章给出的定义是，“国家文化安全是指国家文化主权、人民文化福祉、文化繁荣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文化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①虽然该文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逻辑严谨的探讨，但其关于国家文化安全中的“文化”的理解显然还是停留在将其作为一个被保护对象的层面。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作为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胡惠林发表了论文《新质国家文化安全力：国家文化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策论》，开篇即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保障国家安全之重器”。^②可见，该项目组已经注意到文化作为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的重要性，但并未就此展开更深入的探讨。

与此相对，战后日本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践中，不仅将“文化”视为一个需要与时俱进予以保护的對象，而且将“文化”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予以高度重视。关于文化的概念，虽然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过不同的见解，但一般都认同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的复合体，并且随着时代、社会 and 知识的发展不断演进、日趋复杂。至于日本文化，相关研究论著普遍认为主要指日本民族在特定的历史、自然、社会环境中创造且传承至今的行为与精神活动的总体，至少包括三个互相关联层面的内容，即以实物形态遗留下来的有形文化遗产及传统的生产及生活方式等器物文化层面的内容、天皇制等制度文化层面的内容、价值观等精神文化层面的内容。因此可以认为，天皇制、价值观、文化软实力，既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内容，也自然成为日本维护国家文化安

① 彭泽明：《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和外延辨析》，《文化软实力研究》2024 年第 3 期，第 5—9 页。

② 胡惠林：《新质国家文化安全力：国家文化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策论》，《贵州社会科学》2025 年第 2 期，第 4 页。

全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①

具体考察战后日本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践发现,在其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日本政府对文化的保护和利用也是各有侧重的。大体而言,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比较偏重强调对文化的保护,其后则在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保护文化措施的同时,逐渐强调发挥文化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功能。从1979年4月2日大平正芳内阁设立的“综合安全保障研究小组”于1980年7月2日提交的研究报告来看,当时日本已经认识到,墨守传统安全视角的惯性思维、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已经无法确保国家安全,必须积极发挥文化所具有的增进相互理解、加强睦邻亲善的功能,通过文化外交树立日本良好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好感度,以防患于未然,将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安全风险都消灭在萌芽状态。^②此后日本政府将这一政策付诸实践,积极维护本国的文化安全。本文将侧重从天皇制、价值观、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具体梳理战后日本对天皇制的保护与对皇室的利用、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吸纳与利用以及对日本文化软实力的培育与利用等情况,以期对战后日本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践略作解析。

二、对天皇制的保护与对皇室的利用

国际关系领域权威学者巴里·布赞曾指出民族认同是国家安全研究的中心内容,并从国家安全的视角,根据社会与政治凝聚力的强弱程度将国家分为“强国家”与“弱国家”,拥有天皇制且民族认同度高的日本被划归为国家安全程度高的“强国家”。^③由此可以说,天皇制的兴衰存废直接关乎日本国家文化安全。自诩“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可谓日本国家意识形态及传统价值观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也是日本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时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从日本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来看,日本在维系天皇制存续的同时,也在精心筹划着如何利用皇室来维护其国家安全。

① 崔世广:《21世纪初期日本的文化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② 田中明彦『総合安全保障研究グループ報告書』、1980年7月2日、https://worldjpn.net/documents/texts/IPSC/19800702_OIJ.html[2025-04-16]。

③ 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闫健、李剑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36—178页。

（一）对天皇制的保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日本处于战败地位，天皇制可能被废除的危险不仅来自国外，也来自日本国内。维系天皇制的问题，对日本政府而言，既是一个传统安全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首先，从传统安全的视角来看，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日本面临着如何应对来自外部对天皇制存续的威胁。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 月 30 日下午，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厚木机场。9 月 2 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随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陆续颁布了一道道追究战犯战争责任、肃清日本军国主义的指令。10 月，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发布《废除限制政治、民事、宗教自由的备忘录》，由此日本国内也能够自由讨论是否废除天皇及天皇制等问题。其实，美国早在 1942 年就已经着手研究战争结束后如何处理天皇和天皇制问题，而且内部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最终，美国当局不顾以情报局远东作战处、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为代表的坚持主张废除天皇制的意见，也无视国内外舆论特别是盟国的强烈反对，采纳了以原美国驻日大使、后来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的约瑟夫·C. 格鲁为代表的极力主张保留天皇制的意见，作出了保留天皇和天皇制的决定。这既是美国基于日本国家文化安全特点考虑而作出的决定，也是日本政府及裕仁天皇个人努力的结果。

美国人类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曾指出：“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① 麦克阿瑟也曾评价日本天皇的作用指出：“天皇的力量胜过机械化部队 20 个师团。”^② 因此，充分考虑到日本文化的特点，为了避免废黜天皇而带来负面影响，美国决定剥夺天皇的政治实权、保留其象征地位，以便利用天皇作为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的影响力，更好地实施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出于这种目的，美国政府指示麦克阿瑟：“只要能促进满足美利坚合众国之目标，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国政府的机构包括天皇在内的诸机关行使其权力。”^③ 麦克阿瑟本人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也曾表示：“是我救了天皇的命。……我想，倒不如拯救天皇的生命，让天皇同占领军合作，以利于占领政策的推行。因此，我极力坚持这一主张，挽救了天皇。”^④ 确如其言，

①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年，第 23 页。

② 井上清：《天皇制》，辽宁大学哲学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年，“序言”第 2 页。

③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译，第 206 页。

④ 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李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第 326 页。

天皇制的保存以及裕仁天皇最终逃脱历史的审判，离不开麦克阿瑟的庇护。

而让麦克阿瑟坚定地庇护日本裕仁天皇、保留天皇制，除了出于美国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外，与日本政府特别是裕仁天皇以退为进主动迎合美国占领当局的言行也有很大关系。在日本政府的安排下，1945年9月27日，裕仁天皇主动到麦克阿瑟的私人寓所屈尊拜见了麦克阿瑟。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1986年12月7日公布的美国国务院机密档案显示，自第一次拜见麦克阿瑟后的五年半时间内，裕仁天皇亲自到美国驻日大使馆拜见麦克阿瑟共计11次，每年见面一到两次。最初麦克阿瑟作为战胜国的代表，接见裕仁天皇时态度非常严厉，但经过多次会面接触后，他对裕仁天皇产生了好感。另外，当时的日本政府保守官僚集团为了“维护国体”，使风雨飘摇的天皇制在战后得以延续，同样采取了以守为攻的方法，对促使占领军当局最终决定保留天皇制起了重要作用。^①

其次，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来看，日本政府为了保护天皇制，还必须面对国内要求废除天皇制及裕仁天皇退位的声音。在当时，日本国内有人主张“天皇制不仅与民主主义不相容，而且还是本质上妨害实现人民共和政治之物。如果不彻底打倒天皇制，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主义政治”。^②也有观点认为可以废除天皇制而保留皇室，“民主主义政治既非依靠自上而下的仁慈或者爱护的政治，亦非大权归一的政治。因此，对于宪法规定的天皇大权事项等，应该予以根本性修改或者废除。当然，可以保留作为国民感情上的天皇存在，或者保留皇室作为掌管国家性仪礼的宗家存在”。^③具体到裕仁天皇个人，早在1943年9月意大利无条件投降时，近卫文麿就开始计划让可能因战争责任而受到指责的裕仁天皇选择退位，企图借此换来天皇制的延续。近卫文麿在畏罪自杀前夕的1945年10月23日还发言称：“天皇作为大元帅陛下，对战争负有责任。应该承担战败责任退位，否则难保不会被指定为战犯。应当趁着现在退位，隐居京都为宜。”^④日本民间有识之士中也不乏追究裕仁

① 贾璇、杨华：《战后日本天皇制得以保留的多元因素分析》，《大连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51页。

② 「天皇陛下崩御、嵐の日々から光の中へ—試練の皇室、戦争責任の苦渋越えて—」、『日本経済新聞』1989年1月7日。

③ 「天皇陛下崩御、嵐の日々から光の中へ—試練の皇室、戦争責任の苦渋越えて—」、『日本経済新聞』1989年1月7日。

④ 「天皇陛下崩御、嵐の日々から光の中へ—試練の皇室、戦争責任の苦渋越えて—」、『日本経済新聞』1989年1月7日。

天皇个人责任的声音，如日本国际法学者、曾任日本最高法院院长的横田喜三郎就曾表示：“作为个人的天皇没有想要发动战争也许是事实，但现实是在天皇的认可下战争计划付诸了实施。如此来看，天皇对这场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曾任东京大学校长的南原繁亦称，天皇是最应该深切感受到对这场战争的责任的人。^①

当时的日本政府为了应对国内反对保存天皇制的声音，特意组织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的著名学者，如高木八尺、津田左右吉、矢部贞治、高山岩男、田中耕太郎等，分别从各自研究领域探讨说明天皇制存续的合理根据。^② 最终各方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是，新制定的《日本国宪法》保留了天皇制，裕仁天皇也逃脱了战争问责。需要注意的是，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并没有因为美国的网开一面而被日本人忘却。如 1988 年 12 月，长崎市本岛等市长就曾在市议会全体会议上发言称，“无论是看外国的记述和日本历史学者的记述，还是从自身的军队生活体验来看，裕仁天皇都是负有战争责任的。”此言一出，立刻遭到日本右翼团体的大肆围攻恐吓，但同时也收到了来自日本全国各地表示赞赏声援的电话和信件。由此可见，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并未因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而被彻底忘却。^③

进一步地，日本政府基本化解了来自国内的对天皇制及天皇存续的威胁后，又开始实施提升国民对皇室感情的举措，逐步打造出一个新时代的亲民天皇形象。正是在日本政府及皇室自身的不懈努力下，日本国民对皇室的好感度大幅提升，就连战后初期将“打倒天皇制”作为其行动纲领重要内容的日本共产党，2004 年也从其纲领中删除了“通过民主主义革命废除君主制”的表述，这标志着日本共产党反对天皇制立场的倒退。^④

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流逝，从传统安全视角看，作为意识形态内容的日本天皇制被废除的危险已经几乎降低为零；但从非传统安全视角来看，当下日本不得不直面社会少子超老龄化这一非传统安全层面的问题，皇室成员减少令日本天皇制面临新的存续危机。

① 「天皇陛下崩御、嵐の日々から光の中へ―試練の皇室、戦争責任の苦渋越えて―」、『日本経済新聞』1989 年 1 月 7 日。

② 河西秀哉『「象徴天皇」の戦後史』、講談社、2010 年、12—15 頁。

③ 「天皇陛下崩御、嵐の日々から光の中へ―試練の皇室、戦争責任の苦渋越えて―」、『日本経済新聞』1989 年 1 月 7 日。

④ 陈波、邝蒙：《日本共产党反对天皇制百年立场转圜探因》，《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3 期，第 30—37 页。

（二）对皇室的利用

首先，从传统安全的视角来看，战后 80 年，日本政府可谓充分发挥了皇室作为国家软实力资源的作用，通过安排日本皇室成员接待外宾、参加大型活动、出访外国等多种形式开展所谓“皇室外交”，在重塑日本的国家形象、促进和改善与他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国家软实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①但是，1947 年 5 月 3 日实施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天皇因此只能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其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责。也就是说，从法理上讲，天皇只具有象征地位和礼仪作用，其国事行为受到严格限制，即天皇在战后日本的国家政治与外交事务中已不具有实际权力。特别是“出访外国”，《日本国宪法》中根本没有明确规定。所以，裕仁天皇在战后只有两次特殊的出访，一次是为了重温旧谊于 1971 年访问欧洲，另一次是为了改善日美关系于 1975 年访问美国。真正开启天皇出访外国并将此作为“象征天皇行为”之一，则始于明仁天皇时代。日本政府为了更为合理合法地发挥天皇的作用，遂将天皇出访外国牵强地定性为“国事行为以外的天皇的仪礼性行为”，属于介乎“国事行为”与“私人交际”之间的“公务行为”，如此一来，开展所谓“皇室外交”就非常便于操作了。^②

按照相关规定，安排天皇及皇室成员的出访外国行为等要尊重其本人意愿，但事实上，各类所谓皇室外交活动都被作为日本国家外交手段，是遵从日本政府的意愿而开展的。甚至当日本政府在申办国际赛事出现力有不逮之际，也会请天皇或者其他皇室成员出面。例如，东京都申奥委员会在申办 2016 年夏季奥运会时，就曾计划由拥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的皇太子夫妇（现在的德仁天皇夫妇）出面助力，但时任宫内厅东宫大夫野村一成认为“申办奥运这件事政治性要素太强，皇太子殿下不宜被牵扯进去”。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闻其言后暴怒，甚至在“全国知事会议”及东京都举办的例行记者会上痛批野村一成是“胥吏妄言”，“这不是像宫内厅那种地方能够决定的事情”，“申办奥运会是国民热切期盼之事，我认为宫内厅没有理由反对”，“因

^① 龚娜：《日本皇室外交及其在提升国家软实力中的作用》，《东北亚学刊》2012 年第 1 期，第 18 页。

^② 井上亮「天皇はなぜ外国を旅するのか 令和初の親善訪問を前に」、『日経速報ニュースアーカイブ』2023 年 6 月 14 日。

为皇室是我们好不容易才保存到现在的，所以到了申请东京奥运会这个时候，‘皇太子，为了国家，请出份力吧’，发出这种声音是很自然的事情”。^① 石原慎太郎的言辞虽然蛮横无理，却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宫内厅虽然从保护皇室的角度可以发表意见，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在日本政府。所以，当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与石原慎太郎向日本政府提出相关请求后，2009 年 7 月 23 日时任宫内厅长官羽田信吾在宫内厅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关于皇太子夫妇参与东京申办奥运会活动一事，会完全听从政府安排，但是，“既然已有意见指出此事存在的政治性问题，所以拜托皇室各位参与这种活动是否合适，我认为需要政府从全局上作出判断”。^② 也就是说，纵使皇室有百般不情愿，但如果是日本政府已经作出决定的事情，明知道会被政治利用，皇室也是要服从的。最终，继 2016 年申办奥运会失败后，东京都继续申办 2020 年奥运会并获得成功，当时的皇太子即现在的德仁天皇、高圆宫妃久子与三笠宫彬子等皇室成员，都在宫内厅与日本政府的精心安排下，以不同形式参与了申奥活动。

其次，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来看，日本政府利用天皇在日本文化以及日本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在保护皇室的同时，亦将皇室作为安抚国民、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手段。日本政府的主要做法是安排天皇地方巡行的“公务活动”，包含慰问社会弱势群体、慰问灾区民众、参加慈善活动、祭奠战争牺牲者等，尤其是在国家发生大灾难之时。例如 2011 年 3 月 11 日发生大地震并引发大海啸进而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后，日本社会人心惶惶，大家争相逃离东京，明仁天皇不仅没有离开东京，而且先以电视讲话的形式安抚民心，随后又亲自到避难所慰问灾民，此种行为对日本国民可谓莫大的鼓舞和安慰。特别是 3 月 30 日下午明仁天皇、皇后到东京都避难所慰问来自福岛、宫城两县的灾民时，与灾民一样双膝跪坐在地板上并亲切交谈，此番场景震撼和鼓舞了很多日本民众，因为本该高高在上的天皇与国民一样跪坐、平等视线交流，这是从未有过也是日本民众不敢想象的事情，大大安抚和稳定了日本社会民心。^③

另外，安排以天皇为首的皇室成员参加各类有特殊含义的文化艺术节等，

① 「石原都知事、『宮中行事はほぼ欠席』東京五輪招致で皇太子さまにラブコールの裏で」、『週刊朝日』2008 年 8 月 8 日。

② 「宮内庁、官邸に判断委ねる 皇太子ご夫妻の東京五輪招致協力」、『朝日新聞』2009 年 7 月 24 日。

③ 「東京、両陛下が避難所慰問」、『日本経済新聞』2011 年 3 月 31 日。

也是将天皇作为保护国家文化安全手段的表现之一。在这类文化艺术节中,尤以日本天皇与皇后共同出席的四大节日最具代表性。在令和时代之前,日本天皇与皇后共同出席的全国性节日只有三个,即“全国植树节”“国民体育大会”“全国建设富饶海洋大会”;进入令和时代之后,德仁天皇还是浩宫殿下、皇太子殿下时就一直出席的“国民文化节”,也被列为日本天皇与皇后共同出席的节日。^①“国民文化节”始于1986年,其举办主体为日本文化厅与都道府县、市町村及文化团体等。这是一个将观光、城镇化建设、国际交流、福祉、教育、产业及其他相关领域的施策有机联合,充分展现地方文化资源特色的文化盛典。在“国民文化节”期间,主办方会提供传统艺能、文学、音乐、工艺美术、食文化等文化艺术展演,以此助力文化的继承、发展,推动艺术文化的振兴。由于“国民文化节”更侧重于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振兴,因而又被称为“文化之国体”。^②从2017年开始,日本政府将每年的“国民文化节”与“全国残疾人艺术文化节”合并在一起举办。

其实,“国民文化节”与日本皇室之间,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彼此助益、互相保护的关系。德仁天皇长年持续参加被称为“文化之国体”的“国民文化节”,无疑会进一步增强日本国民对德仁天皇的认同感;而随着日本国民对德仁天皇认同感的不断提升,德仁天皇言行的影响力又会越来越强,其出席的各种活动也会吸引更多的日本民众参与。例如2025年4月12日开幕的大阪世博会,日本政府与大阪地方政府、经济界可谓全力以赴,但日本国民对此缺乏热情,日本媒体对大阪世博会的负面报道也非常多,甚至还有日本在野党“令和新选组”共同党代表、众议员大石晃子组织民众在开幕当天举行游行活动以反对举办大阪世博会。^③面对这种种不利情况,为提振人气,大阪世博会不仅聘请皇太子秋筱宫担任名誉总裁,还邀请了德仁天皇夫妇、皇太子秋筱宫夫妇一同出席开幕式;5月8—9日,又邀请爱子公主莅临大阪世博会;5月22—23日,邀请皇太子秋筱宫妃纪子再度莅临大阪世博会以汇聚人气。另外,从具体行程来看,日本皇室成员几乎全体动员莅临了此次大阪世博会,

① 「特集『令和』新時代、公務のあり方、模索、『四大行幸啓』で交流」、『日本経済新聞』2019年5月1日。

② 「『文化の国体』国民文化祭、岩手県で68年度に一東北初、3万人が参加—」、『日本経済新聞』1988年4月12日。

③ 「雨の開幕、熱気と混乱 ゲート、早朝から長蛇の列 大阪万博」、『朝日新聞』2025年4月14日。

其目的显然不仅仅是吸引大批日本民众，齐心助力大阪世博会的成功举办，更是与日本政府的外交安排相配合，积极开展独具特色的世博会皇室外交。

三、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吸纳与利用

从日本文化发展史来看，日本自 16 世纪开始通过引进和模仿欧美西方文化来塑造自己的文化，但在吸纳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时，也一直是与维护其传统文化安全为前提的，在表面上看似主动吸纳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动接受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时期亦复如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已经传入日本，所以在战后美国主导的民主改革时期，西方社会向日本灌输的价值观内容对日本民众而言并不陌生，从日本政府维护其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来讲，应对起来也比较从容。

（一）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吸纳

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早在 19 世纪后期就已经通过各种翻译著作传入日本，日本社会也因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自由民权运动。以板垣退助等为首的自由民权运动家组织政治团体，批判政府专制，要求制定宪法、开设国会。在自由民权运动兴起之初，明治政府虚与委蛇地接受了其部分要求。但是，1887 年 12 月，为了应对愈演愈烈的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府制定了《保安条例》，禁止一切秘密结社及集会，甚至规定必要时警察有权禁止已经得到许可的室外集会、将危及社会安全的可疑者驱逐到离皇居 12 公里以外且三年内不得进入等。根据这一《保安条例》，明治政府逮捕了数千名自由民权分子，包括中江兆民、片冈健吉在内的数百名原自由党及立宪改进党成员也遭到驱逐，自由民权运动遂告结束。

自由民权运动作为一场政治文化运动，对促进日本国民国家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需注意的是，自由民权运动者倡导的所谓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有其历史局限性，充满了矛盾。这是因为其所倡导的理念仅适用于日本国内，而不包括日本以外国家的民众，甚至为了所谓的日本国家利益，自由民权运动者不惜牺牲其他国家民众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甲午战争爆发后板垣退助积极支持日本政府对外发动战争的言行，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有学者指出：“过去中国学者评价板垣退助有进步的政治思想，而且能够果断地实践，但在对邻国的关系上坚持武士阶级对外侵略扩张

的反动立场。实际上,这是对近代国民国家的一种认识误区。正如‘国民国家论’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国家既有国民主权,也有国家主权,民权和国权是对立的统一,自然会出现‘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现象,即主张对内争取民权、对外争取国权,两者相辅相成。国家给予国民应有的政治地位和权利,国民就有义务去维护国家的利益或权利。”^①

上述这种将自由民权运动者理想与现实言行相悖的现象理解为国民国家会自然出现的“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现象,也只是看到了一个表象。其实,自由民权运动者的行为模式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文化及其国民性的特点。即使是在日本国内,受日本传统文化特点的制约,所谓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也并非完全适用于所有日本人。换言之,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有资格享受其所要争取的“民权”和“国权”。自由民权运动所倡导的价值理念适用的人群,至少不包括两类人。一类是被排除在“士农工商”之外的社会最底层的贱民,日语称之为“非人”或者“部落民”“河原者”“散所者”“秽多”“皮多”等。所谓“四民平等”,实质上只是“士农工商”阶层名义上的平等而已,“非人”是不敢奢望共享自由、平等与人权的。另一类则是高高在上、以天皇为首的皇族和华族。相较于前者窘迫的生存状态,后者衣食无忧、有一定保障,但也是没有人权的。简言之,所谓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虽然看似遍及日本社会各个角落,但当其要真正撼动日本人心目中类似文化基因一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结构时,便会遭到强烈抵制。正如“和魂洋才”一词所示,对日本人而言,所谓的“才”并非仅仅指西方技艺及制度文化内容,西方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实质上也被划归于“和魂洋才”的“才”类内容中。换言之,这些西方资本主义价值理念就是一种政治工具而已,好用则用,否则随意随时弃之也毫不可惜,更不会有任何纠结。这种现象在紧随明治时代自由民权运动之后兴起的大正民主运动中也有所体现。因此,研究日本现代化的学者们才会感慨日本的文化现代化是非常滞后的。^②

从接纳西方制度文化内容的角度来看,大正民主运动推动了日本普选法的制定和政党内阁制的确立,可谓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民主主义发展的顶点。在日本近代史上,“一方面,大正民主运动中孕育和成长的民主传

① 王新生:《国民国家与近代日本宪政之路——以自由民权运动为中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61—67页。

② 周维宏:《战后日本社会现代化进程测量和分析》,《日本学刊》2015年第6期,第127—141页。

统，成为日本民主运动中的宝贵精神财富。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日本各阶层人民进一步继承、发扬并开花结果，极大地促进了战后日本资产阶级民主化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正民主运动为战后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创造了历史前提条件和内在可能性。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政党同藩阀官僚势力的妥协，为军部专制势力的抬头和政党政治的崩溃埋下了隐患。1931年后，日本统治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在内）为摆脱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逐渐乞灵于法西斯主义，妄图通过对内加强专制统治、对外扩大侵略战争，为日本帝国主义寻求出路。于是，军部乘机与民间法西斯势力勾结，频频起事，于1932年5月推翻政党内阁制。1936年后，又通过‘二二六事件’建立军部独裁，使日本走上法西斯化道路”。^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令日本帝国主义惨败，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下，除了解散军队等暴力机构、惩治战争罪犯并大规模整肃军国主义分子外，还强制推行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一系列民主化改革。其中最具代表性意义的，莫过于日本民众对贯彻了所谓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西方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和平宪法”的欣然接受。1946年11月3日颁布、1947年5月3日起实施的《日本国宪法》，是战后日本民主化改革的总结和结晶，它规定了日本国家的根本制度、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成为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的总目标。与此同时，自1945年东久迩内阁至1956年第三次鸠山一郎内阁，日本历届首相在施政方针演说中强调最多的就是号召日本国民要以美欧等西方国家为榜样建设日本，以期早日成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一员。^②日本民众和政治家的种种顺从表现甚至被英美学者讥讽为“拥抱战败”的“顺从的畜群”。^③但事实是，日本人表面顺从的做法不过是为了维护自身国家文化安全而采取的暂时性阳奉阴违、委曲求全之谋略，日本传统文化价值观并没有受到根本触动。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国家文化安全虽然形势严峻，但还算不上危险。

例如，从对待“人权”问题的状况来看，日本国内的人权事业发展极其滞后，至今依旧面临着诸多严重的问题。且不说日本内外有别地对待外来务

① 李玉：《试论日本的大正民主运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第113—114页。

② 张建立：《战后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轨迹及成因》，《日本学刊》2015年第5期，第29页。

③ 约翰·W. 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91页。

工人员的人权问题，亦不必探讨固有且残存至今的部落民人权问题，仅仅关注因夫妻分姓而凸显的女性歧视问题及以天皇为首的皇族的人权问题，即可发现标榜尊重人权的日本是多么的言不由衷、名不副实。从国家文化安全角度来看，赞同夫妻分姓、承认天皇有人权都是对日本传统文化安全的一种威胁。2019年明仁天皇提前退位，使天皇的人权问题再次受到世人关注。加之根据现行《皇室典范》，德仁天皇唯一的女儿爱子公主不能继承天皇之位，此事又凸显了日本社会存在已久的深刻的女性人权问题，更引发了世界的关注。

2024年10月29日，“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上向日本政府发出呼吁，建议日本“引入选择性夫妇分姓制度，修改母体保护法中需要配偶同意的堕胎规定，废除对婚外子的歧视性条款”，以促进法律上的性别平等。这已经是自2003年以来该组织针对夫妇分姓问题对日本政府第四次提出建议。^①同时，该委员会还建议日本修订1947年制定的《皇室典范》，以推动皇位继承中的性别平等。尽管皇位继承作为日本特有的文化传统有其历史渊源，但该委员会指出，当前仅限男性继承的规定已经与现代国际平等观念产生了冲突。这一提议不仅再次将日本性别歧视问题置于全球关注的焦点，更引发了日本各界对皇位继承制度变革的深层讨论，赞同女性天皇的舆论呼声日益高涨。日本政府对此迅速作出了激烈反应，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于2024年10月30日表示强烈抗议，称国际社会不应干涉日本的传统文化和国家根基，并再次要求撤销与皇位继承相关的内容。林芳正强调，《皇室典范》的制定与日本的国家主权密切相关，不应将其视为歧视条款。他指出，只有从父亲一方继承了天皇血统的男性才有资格继承皇位这一规定并非对女性的歧视，而是出于传统和继承稳定性考虑。^②

无论出于传统安全角度还是出于非传统安全角度考虑，真正事涉日本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时，日本政府是不会轻易让步的，不仅不会让步，还会采取反制措施。2025年1月29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北村俊博在记者会上表示，因为“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拒不接受日本政府要求其删除关于《皇室典范》的记述，所以已于1月27日通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OHCHR）中止该委员会使用日本提供的经费，并取消接待该委员会委员赴日本开展相

① 「国連委、夫婦同姓義務『法改正を』皇室典範見直しも勧告」、「日本経済新聞」2024年10月31日。

② 龚娜：《联合国敦促日本改革皇位继承制的背后》，《世界知识》2024年第23期，第68—69页。

关调研等活动的原定计划。^① 日本政府的蛮横表现,不仅让我们真正理解了所谓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对日本而言不过是个便利的外交工具,而且也能够看清楚日本国家文化安全真正要守护的是什么。

(二) 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利用

从非传统安全视角来看,日本政府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不过是对日本民众的敷衍而已。以本该最能彰显其民主色彩的日本国会为例,虽然日本在形式上效仿西方设立了议会内阁制,而且依照相关法律设立了负责众议院、参议院运营的“议院运营委员会”,但这些机构事实上都近乎形同虚设,真正负责运营众议院、参议院的是日本法律中没有规定的“国会对策委员会”。具体而言,众议院、参议院的议程都是隶属于各个政党的“国会对策委员会”私底下交涉妥当后,再由合法的“议院运营委员会”予以追认,并作为正式合法议程,安排各个党派按照“国会对策委员会”写好的脚本演给日本国民看。

“国会对策委员会”也被日本各个政党视为培养年轻政治家的重要平台。比如长期一党独大的自民党,为了培养议员的交涉能力,会安排新当选的众参两院议员全部加入“国会对策委员会”。自民党的“国会对策委员会”目前大概由 50 名国会议员构成,前辈议员会悉心传授新议员通过私下交涉在各政党与官僚中搭建人脉的方法。统帅“国会对策委员会”的委员长,不仅是介于政党党首与干事长之间,也是介于政党与政党之间的最重要的利益勾兑桥梁。能胜任这一职务的政治家,即使未能登上首相宝座,也大多是政党内最有实力和影响力的人物。^②

从传统安全视角来看,日本政府最擅长的就是依据所谓自由、民主、人权之类的空洞概念,搞最没有价值的“价值观外交”和“人权外交”。之所以说其最没有价值,首先是因为日本虽然高喊尊奉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但其判定标准与此无关,而是看是否契合日本政府意愿,极具肆意性。日本对日韩关系的界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安倍晋三初任首相的 2006 年,日本政府为了拉拢韩国开始推行所谓“价值观外交”。10 月 9 日安倍就任日本首相后的首访选择了韩国,与韩国总统卢武铉会谈,并称“日韩两国作为共享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等基本价值的伙伴,

① 「政府、国連委への不拠出伝達 皇室典範見直し勧告に抗議」、『日経速報ニュースアーカイブ』2025 年 1 月 29 日。

② 「国会を仕切る『国対』とは何か」、『日経速報ニュースアーカイブ』2023 年 2 月 11 日。

要努力构筑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① 其后直至 2014 年，无论短暂执政的民主党政权时期还是再度执政后的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日本外务省每年发布的《外交蓝皮书》基本上都将日韩关系定位为“日韩两国是共享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等基本价值的重要邻国”。^② 但是，日韩关系因历史问题恶化后，2014 年底，日本外务省网站首先将韩国“踢出”了其价值圈子，仅称韩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2015 年 4 月日本外务省发布的《外交蓝皮书》也改称“日本与韩国彼此是最重要的邻国，良好的日韩关系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可欠缺”，^③ 不再把韩国归属为与日本共享所谓自由、民主与基本人权等价值理念的国家。2015 年 12 月 28 日，日韩两国政府就“慰安妇”问题仓促达成协议，此后日本对日韩关系的定位表述进行了微调，外务省在 2016 年 4 月及 2017 年 4 月发布的《外交蓝皮书》中均称“对日本而言，韩国是共享战略性利益的最重要邻国。良好的日韩关系，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可或缺”^④。

2017 年 5 月 10 日至 2022 年 5 月 10 日文在寅担任韩国总统期间，日本对日韩关系的定位没有太大变化。2018 年版《外交蓝皮书》谈到日韩关系时，只是强调“日韩两国的合作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可欠缺”，两国需要在各个领域加强沟通，增进互信，面向未来建构新时代的日韩关系。^⑤ 2019 年版《外交蓝皮书》主要列举了日韩之间存在的种种问题，没有定性的概述。至 2020 年，日本《外交蓝皮书》关于日韩关系的描述只是一句极为寡淡的定性评价，即“韩国对日本是重要邻国”，2021 年版和 2022 年版的《外交蓝皮书》中更变成了“韩国是重要邻国”。^⑥

2022 年 5 月 10 日，尹锡悦就任韩国总统，开始致力于改善韩日关系。于是，日本在 2023 年版《外交蓝皮书》中增加了“要奉行以自由为首的普遍价值理念”等文字，关于日韩关系的定性也更加丰富，称“韩国是应该合作应对国际社会各种各样课题的重要邻国”。^⑦ 2024 年版的《外交蓝皮书》又称：“2023 年是日韩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的一年。韩国是值得作为伙伴合作应对国际

① 外務省『外交青書 2007』、2007 年 3 月、22 頁。

② 外務省『外交青書 2014』、2014 年 4 月、23 頁。

③ 外務省『外交青書 2015』、2015 年 4 月、21—22 頁。

④ 参见：外務省『外交青書 2016』、2016 年 4 月、15 頁；外務省『外交青書 2017』、2017 年 4 月、20 頁。

⑤ 外務省『外交青書 2018』、2018 年 5 月、26 頁。

⑥ 参见：外務省『外交青書 2020』、2020 年 5 月、31 頁；外務省『外交青書 2021』、2021 年 4 月、39 頁；『外交青書 2022』、2022 年 4 月、16 頁。

⑦ 外務省『外交青書 2023』、2023 年 4 月、62 頁。

社会各种各样课题的重要邻国。特别是面对当下严峻的国际环境，日韩两国为了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一共同利益，有必要深化在多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宽合作的范围。”^① 2025 年版《外交蓝皮书》也称：“韩国是值得作为伙伴合作应对国际社会各种各样课题的重要邻国。面对当前的战略环境，日韩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变化。”^② 可以认为，在尹锡悦不顾一切努力改善韩国与日本关系的背景下，日本再次勉强承认“韩国是其合作伙伴”，但依旧未将其视为“可以共享同样价值理念者”。在日韩恢复邦交 60 周年的 2025 年，亲日的尹锡悦被弹劾下台，日本何时才能再次认定韩国是可以与其共享价值理念的国家不得而知。

之所以说日本的“价值观外交”和“人权外交”无价值，还有一个原因是日本处心积虑地借此在国际社会上拉帮结派，却未能收获预期效果。如前述“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不畏日本政府的施压，多次公开呼吁日本政府要努力解决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的严重的女性人权问题，令日本政府十分尴尬，甚至以不再提供经费相威胁。对日本而言，新近的打击莫过于美国政府在毫无通报的情况下宣布对日本实施“对等关税”一事。自特朗普政府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所谓“对等关税”以后，一直紧紧追随美国大搞所谓“价值观外交”和“人权外交”的日本，自持其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盟友的身份，满心以为能够逃过此劫，却未料到特朗普竟然连事先通报都没有，便宣布针对日本，在此前对汽车及零部件征收 25% 关税的基础上，对其他输美商品也加征 24% 的“对等关税”。于是，有日本媒体发文惊呼“日美同盟要消亡了吗”。^③ 对此，就连安倍晋三时代的重要政府智囊北冈伸一也奉劝日本政府不要再搞“价值观外交”，因为欧美对发展中国家搞的那一套民主化做法就没有几个成功的。^④

四、对文化软实力的培育与运用

发掘文化资源，构建软实力，对内提振民族自信心，对外提升国家形象，这可谓战后历届日本政府的共同使命。虽然日本政府在 2009 年 3 月发布的《日本品牌战略——将软实力产业变为经济成长的原动力》中，首次明确提及

① 外務省『外交青書 2024』、2024 年 4 月、59 頁。

② 外務省『外交青書 2025』、2025 年 4 月、19 頁。

③ 永沢毅「日米同盟は消滅しないか」、『日本経済新聞』2025 年 4 月 13 日。

④ 北岡伸一「外交の力点、東南アジアに」、『日本経済新聞』2025 年 1 月 8 日。

日本文化政策中的“软实力”，但无论从传统安全的视角还是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来考察，日本政府培育和运用文化软实力以维护其国家安全的实践，早在战后初期就已经开始。

（一）对文化软实力的培育

战后日本对其文化软实力的培育大体是从三个层面予以展开的，依次为确认何为日本文化、发掘保护文化资源以及对日本文化重新赋能。从实践层面看，战后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更侧重于确认何为日本文化以及发掘保护文化资源这两个层面的工作；70年代以后，对文化软实力的培育则逐渐转为加强对日本文化的重新赋能，即由最初的发掘保护文化以提振民族自信心、重构国民文化身份认同，逐渐转向通过振兴和利用文化对内拉动经济成长、对外提升国家形象，以维护国家安全。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对日本国民的民族自信心造成了剧烈冲击。战后初期，因发动侵略战争而丧失国家主权、军力消耗殆尽、经济衰败的日本，无论在意识形态、价值观还是在传统文化方面，皆面临严重的危机。究竟何谓日本人？何谓日本文化？让日本人重拾民族文化自信心、重构日本国民的文化身份认同，成为日本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重大现实理论问题，也是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重大使命。在此背景下，1947年，时任首相片山哲首次提出了建设“文化国家”的执政目标。据此，日本社会开始从多领域推进相关工作。

一方面，自战败至2000年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人类学者尾本惠市主持的文部省重大项目“关于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起源的跨学科研究”结束，在长达50余年的时间里，日本学界一直背负着重构日本国民文化身份认同的重大使命，围绕日本民族文化的起源与形成问题，以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为核心，综合历史学、文学、语言学、民俗学、农学、生态学、遗传学、建筑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学者，以位于东京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和位于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为主要学术平台，通过各种形式开展了大规模跨学科比较研究。^①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积极推进发掘保护文化资源的相关工作，其中一个行之有效并坚持至今的举措就是举办文化艺术节。1946年9月至10月，日本

^① 佐々木高明「戦後の日本民族文化起源論—その回顧と展望—」、『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2009年第2号、211—228頁。

文部省举办了第一届文化艺术节，时任文部省艺术课课长的今日出海^① 在阐述举办文化艺术节的目的是说：“将历史悠久、绚烂多姿的日本传统艺能文化集聚一堂来观赏、重新认识、再探讨，这对于停战一年后终于着手祖国再建的国民来说，是必要且有意义的。通过举办文化艺术节，保存旧文化、弘扬新文化，必将给国民以极大的鼓舞，增添其建设明天的力量。动员所有艺能团体和艺能人士举办文化艺术节，既是为了建设新的日本文化，同时也是希望能跨越国境向海外宣扬现代日本的精华。日本虽然战败了，但在文化上并不输美国。希望借此让日本国内外都能认识到日本拥有外国所不及的优秀传统文化。”^② 此后至今，一年一度的文化艺术节成为日本文部省的一项重要工作。最初文化艺术节是以日本传统的歌舞伎、能乐、舞蹈、民俗艺能等舞台文化艺术为主要表演形式，后来渐渐将参加演出的范围扩大到电视、电影、唱片等部门。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日本政府实施“地方创生政策”以后，除了日本政府主办的文化艺术节，日本各地方政府也纷纷探索举办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节。无论从举办主体还是从举办规模等来看，文化艺术节的水平都远超既往，并发展成为日本政府推行“观光立国”战略的支柱性举措之一。2024 年以来，因新冠疫情被迫中断的文化艺术节重新举办，而且形式更加多样化，被赋予的功能亦更加多元。

此外，日本对文化软实力的培育，还格外注重通过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文化立法，从制度层面强化对文化资源的保护以及对日本文化重新赋能的有效落实。截至 2025 年 5 月，仅题名中含有“文化”的日本法律就已达 66 部，如果将文化相关法律加起来则多达数百种。^③ 比较重要且有代表性的法律包括，1950 年颁布《文化遗产保护法》和《图书馆法》，1951 年颁布《宗教法人法》和《博物馆法》，1966 年制定《日本艺术文化振兴会法》，1970 年全面修改《著作权法》等。从其名称可以看出，这些法律大都是针对某一特殊领域的立法，内容则以保护文化艺术的举措为核心。

以 1964 年东京奥运会和 1970 年大阪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为契机，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得到显著提升，因此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日本对其文化软实力的培育开始转向探讨如何对日本文化重新赋能，特别是对文化

① 今日出海后于 1968 年出任日本文化厅第一任长官，1972 年又出任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第一任理事长，为日本文化的发掘保护和传播推广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 南博編『戦後資料 文化』、日本評論社、1973 年、357 頁。

③ 総務省「e-Gov 法令検索」、<https://laws.e-gov.go.jp/result> [2025-05-26]。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的期待日益增强。如1971年版《外交蓝皮书》在阐述日本外交基本方针时即称：“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就国家利益而言，我国的安全与繁荣严重依赖亚洲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和平的基础上持续推进自由的国际经济交流，才是我国赖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因此，我国的外交目标必须通过努力增进与各国间协调友好的外交关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国际合作维护和平、共谋繁荣，缓解国际紧张局势来实现。”^①

2001年12月7日，日本政府公布实施《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明确赋予了日本文化艺术维护世界和平的功能。该法律确立了日本国家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政策目标和基本方针，明确了政府以行政手段支持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责任与义务，推出了一系列促进文化艺术繁荣的举措，促成了日本推动其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综合性体制，堪称“战后日本文化艺术立法的集大成”，为21世纪日本文化艺术振兴及文化艺术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律层面的基本保障。2017年6月23日，日本政府又公布了对《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加以修订而成的《文化艺术基本法》。无论《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还是《文化艺术基本法》，在其“前文”中皆宣称：“文化艺术可以在培育人们的创造性、提高其表现力的同时，为人们提供心心相通、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土壤，形成可以接纳彼此、内心丰富的多样性社会，为世界和平作贡献。”^②日本一些著名传统文化传承人也积极践行这一精神，如日本茶道里千家第十五代家元千玄室就曾在回顾他为何不辞辛劳地向世界传播日本茶道时称：“日本茶道是美国文化所不具有的，所以我才秉持着‘一碗茶中出和平’的理念，开始了向世界普及茶道之旅，并把第一站选在了美国。”^③

从《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与《文化艺术基本法》的制定来看，实质上也是一个探讨何谓日本文化艺术、提炼独具日本特色的文化艺术内容并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分类的过程。虽然这两部法律名称中都有“文化艺术”这一表述，但从其使用情况来看显然尚未能给出一个更为精准的定义。例如，这两

① 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1971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71/s46-1-2-2.htm> [2025-05-26]。

② 参见：『文化芸術振興基本法』、https://www.bunka.go.jp/seisaku/bunka_gyosei/shokan_horei/kihon/geijutsu_shinko/kihonho.html [2025-05-26]；『文化芸術基本法』、https://www.bunka.go.jp/seisaku/bunka_gyosei/shokan_horei/kihon/geijutsu_shinko/kihonho_kaisei.html [2025-05-26]。

③ 千玄室『生かされている喜び』、淡交社、2006年、10頁。

部法律中均将“艺术”细分为“艺术”与“媒体艺术”两类。其中，第八条规定，所谓“艺术”是指除了媒体艺术之外的“文学、音乐、美术、写真、演剧、舞蹈及其他艺术”；第九条规定，所谓“媒体艺术”是指“电影、漫画、动画、利用电子计算机及其他电子机器等创造的艺术”。在中文语境中，“艺术”与“媒体艺术”是不可能被理解为并列关系的，但在这两部日本法律中显然是作为并列内容来处理的，这也反映出日本对“文化艺术”概念的理解尚处于探讨中，对文化艺术资源的发掘分类工作仍在持续。之所以会如此，大概与日本政府在培育文化软实力的实践中，一直与时俱进地探索和培育真正独具日本特色的新文化资源有关。事实上，《文化艺术基本法》中大量增补了《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中没有的内容，其中“和食文化”就是近年来日本政府倾力打造并写进了《文化艺术基本法》的文化艺术。

2001 年公布实施的《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中还没有关于“和食文化”的记述，该法律第十二条规定，“生活文化”包括茶道、花道、书道及其他与生活相关的文化。2014 年，“和食：日本人的传统食文化——以正月为例”成功申请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无形文化遗产。以此为契机，2015 年 2 月 4 日，日本成立了“一般财团法人和食文化国民会议”（简称“和食会议”），旨在向日本国民普及“和食”的价值，保护和传承“和食”。“和食会议”强调有意避开“日本料理”这种表述，而是专门使用“和食”来表达日本人的传统食文化。所谓“和食”，其主要特点有崇尚食材多样、新鲜并保持原汁原味，健康饮食营养均衡，能够充分展现自然的美感与季节的变换，与正月等年中节庆礼仪密切相关。“和食会议”的成员包括日本食品生产厂家、流通业、饮食服务等各类企业、团体，以及地方性乡土料理保存会、食育团体、非营利组织（NPO）、料理学校等与饮食相关的团体、地方自治体甚至个人；其管理者涵盖产、官、学三个领域的精英人物，可谓是一个举日本全国之力保护“和食”的团体。^① 2017 年，《文化艺术基本法》首次将“和食文化”纳入“生活文化”类，该法律第十二条规定，“生活文化”包括茶道、花道、书道、和食文化及其他与生活相关的文化。需要提及的是，正是这种“及其他与某某相关的文化”的句式，为日本政府与时俱进地增补必要的文化艺术内容留出了空间。

据此，近年来日本社会开始营造一种举国合力打造“和食文化”的声势，

① 一般社団法人和食文化国民会議、<https://washokujapan.jp/conference/> [2025 - 05 - 10]。

文化厅为了保护传承和培育创新“和食文化”，还与“和食会议”共同开展了“100年美食”与“食文化博物馆”的认证活动。2023年3月27日，日本政府借文化厅整体搬迁至京都之机，配合2025年大阪世博会向世界推介“和食文化”，还特意在京都成立了以文化厅长官为部长、吸纳相关职能部门参加的综合性“食文化推进本部”，积极开展各类“和食文化”推广活动。

（二）对文化软实力的运用

战后日本在运用其文化软实力时比较注重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断提升日本文化“引进来”的魅力与“走出去”的能力。为此，文化软实力建设工作自启动之初就不是仅由文部省或文化厅一个部门来承担的，而是几乎所有政府部门共同参与的国家发展大战略。各省厅突破彼此的管辖界限，分工合作、各守其职、各尽其责。其中，文化厅、经济产业省、总务省、农林水产省主要负责挖掘日本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软实力以提升日本国家魅力；经济产业省、外务省、总务省、农林水产省主要负责将日本文化推介给世界；观光厅、外务省、法务省、经济产业省主要负责将世界招揽到日本。各个省厅具体负责的领域和职责，在相关报告、政策中均有详细规定。^①这种培育文化软实力的综合运用机制，大大提升了日本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综合能力。

首先，关于不断提升日本文化“引进来”魅力的相关举措，一般会想到“文化立国”及“观光立国”战略，但从利用文化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看，更为具体且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是日本外务省基于长远谋划维护国家安全考虑而设计的一系列国际交流项目。例如，近年来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战略价值凸显，日本出于维护其自身国家能源安全问题等考虑，也开始积极参与太平洋岛国事务，并试图通过强化与太平洋岛国的文化联系及促进人员交流、人才培养等项目，在思想和价值观等方面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2015年日本政府启动了旨在“加强与亚太地区的交流，促进相互理解和合作”的对日理解交流项目（JENESYS），并持续至今未曾间断。该项目广泛邀请亚太、北美、欧洲和中南美洲国家和地区的优秀高中生及社会精英人士等赴日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促进这些人才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及外交政策的理解，让他们从多个角度“感受日本的魅力”，并从中发掘亲日派和知日派，以此夯实拓展日本外交的基础。尤其是针对南太平洋地区，

^① 経済産業省「クールジャパン戦略について クール・ジャパン官民有識者会議（第1回）— 配付資料8—」、2010年11月19日。

2016 年,日本政府面向太平洋岛国年轻行政官员启动了较具代表性的“太平洋岛国领导者教育支援项目”(Pacific-LEADS),旨在培养太平洋岛国的未来领袖。目前,该项目已转型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全球领导者课程,持续接纳来自太平洋岛国的青年行政官员及民间精英,邀请他们赴日本高校及研究生院深造并感受日本文化魅力。

在不断增强日本文化魅力及感染力的同时,日本还通过强调与太平洋岛国在历史上的联系,构建一种“共享历史”的叙事,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在此基础上,日本积极推动“太平洋人”共同身份的概念,将自身融入南太平洋地区的文化与社会语境中,塑造一种深层次的情感与心理联系,以此培植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文化软实力,提升日本在区域事务中的影响力,构建基于共同身份认同的外交叙事,进而很自然地推动与自身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议题。

其次,关于不断提升日本文化“走出去”能力的举措,可以从人的交流与文化产品的投放两个方面来考察。在人的交流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除了横跨多个行业领域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海外志愿者派遣项目“JICA 海外志愿服务队”(JOCV)外,当首推日本文化厅开展的“文化交流使”项目。“文化交流使”的派遣始于 2003 年,即将居住在日本的艺术家、文化人派到海外生活一段时间,并在当地进行与日本文化相关的讲演、讲习和实际操演等,以宣扬日本的民族文化、美化日本的国际形象。整体而言,该项目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文化交流使”既有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也不乏现代文化的研究家和精英人物。也就是说,“文化交流使”的专业领域涵盖了日本品牌文化的大部分内容。第二,从“文化交流使”的个人简历及被派遣国的情况来看,日本政府对与亚洲国家进行这种艺术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不很积极,而是更加注重向欧美国家推介其民族文化。

除了继续推进“文化交流使”派遣事业,2016 年日本政府又开始进行遴选和派遣“酷日本大使”的工作。日本政府意识到将日本的魅力作为“酷日本”向海外宣介的重要性,特意选择在各个领域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日本人或者喜欢日本的外国人作为“酷日本大使”,各相关省厅随时将日本在国内外实施的“酷日本”活动信息汇总给“酷日本大使”,并请他们通过自己的渠道向全世界发布信息,广泛宣传“酷日本”。不仅如此,“酷日本大使”也可以自行选择个人认为“酷”的日本魅力之处,积极向海外宣介。第一批入选的“酷日本大使”比较关注日本饮食文化与观光领域的魅力。为了有力支撑该项事业顺利开展,日本政府还注重挖掘能够向海外宣介各地方“酷日本”

资源的专业知识人才，建立人才数据库，使之在向各地方提供信息的同时，促进能够形成全日本共识的网络建设。

至于日本向世界各国投放文化产品的活动，就其特点而言，非常注重因国而异、因地制宜，分门别类、有的放矢地投放日本文化产品，以提升日本良好的国际形象，进而达成用文化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的预期目的。具体而言，影视作品、动漫等便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产品。日本广播协会（NHK）自1983年4月4日至1984年3月31日播映的晨间小说连续剧《阿信》可谓一个典型案例。《阿信》是NHK电视部开播30周年纪念电视剧，共有297集，每集15分钟，由日本著名编剧桥田寿贺子撰写剧本，讲述了日本八佰伴的创业史。该剧是日本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国内首播期间的平均收视率达52.6%，也是20世纪80年代最轰动的电视剧之一，已经在全世界6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播映。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报告显示，就《阿信》的海外最高收视率而言，伊朗为82.0%、泰国为81.6%、中国为75.9%，皆超过了日本国内的62.9%。尤其是在泰国，当时泰国国内抵制日货运动正处于高潮期，《阿信》的播映使很多泰国人深受感动，也因此大大改善了日本在泰国社会中的“经济动物”“暴发户”形象。而且，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还掀起了一股“阿信热”，玩具商人以此为创意生产了很多关联产品并获得热销，甚至还有人用阿信来命名自己经营的西餐馆等等，这一切都为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2012年5月经济产业省围绕日本文化产品在世界各国的影响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电视剧《阿信》是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品之一。^①日本前文化厅长官近藤诚一亦曾指出：“文化软实力是远胜于金钱、武力之类的硬实力。如果能够巧妙地运用好软实力，会赢得对方由衷的喜欢，维持长久良好的人际关系。难点在于传播沟通的方法，一旦沟通失败，则会出现反效果。如伊拉克战争时期，居住在美国的阿拉伯裔人制作了宣传美国是自由伟大国家的录像，但在中东国家进行宣传的效果适得其反。而日本制作的电视剧《阿信》中主人公与逆境抗争的形象，出乎制片方意料地获得了多个国家的好感和认同。”^②

如果说推介动漫与影视作品，可能会因其内容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那么新增的“和食文化”，作为日本人在传统日本料理基础上精心打造的文化软实力

① 経済産業省『クリエイティブ産業海外展開強化に向けた調査報告書』、2012年5月、2—6頁。

② 「文化のソフトパワー信じて（5）前文化庁長官近藤誠一さん（人間発見）終」、『日本経済新聞』2014年6月13日。

资源，实际运用的局限性则少了很多。日本外交官甚至将“和食文化”视为维护日本国家安全的重要底牌来对待。2025 年 5 月 2 日的《日经新闻》晚报上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要用和食抓住世界的胃！软实力外交的核心”的文章，开篇即指出“‘日本目前面临着战后最复杂严峻的安全保障环境’，石破茂首相就任以来一直反复强调这一点。在外交的重要性空前高涨的当下，日本是否拥有独特的底牌？外交官们给出的答案是，和食文化就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底牌”，并详细介绍了日本驻外使领馆借助“和食文化”开展外交的情形。

比较而言，日本的文化资源算不上丰富，但日本政府非常善于发掘自身及国际社会文化资源，并结合当下较新的理念，与时俱进调整文化资源配置，有的放矢地构建和发挥其软实力。在日本产、官、学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文化本身已被打造成一种重要的国家战略手段，对日本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①

五、结 语

基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视角，很容易将战后日本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践仅仅视为源于日本军事安全欠缺而将文化作为弥补武装安全缺失或匮乏的手段，以及顺应战后文化因素在国家战略中比重日益增加的国际整体趋势的产物。换言之，战后日本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践很容易被理解为军事安全的衍生物。但事实是，国家文化安全本质上是指国家文化主权、人民文化福祉、文化繁荣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文化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② 因此，无论从战后日本军事安全发展情况以及当前复杂的世界形势来看，还是从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属性来看，国家文化安全与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社会安全等紧密相连，但绝非某一领域安全的衍生物；战后日本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践，既非完全囿于战后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亦非战后日本军事安全的衍生之物。

从战后日本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实践的效果来看，对天皇制的保护与对皇室的利用，的确发挥了维护日本国家认同感、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作用，但

① 宫本葵·田岛如生「世界の胃袋、日本食でつかめ！ソフトパワー外交の軸」、『日本経済新聞』2025 年 5 月 2 日。

② 彭泽明：《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和外延辨析》，《文化软实力研究》2024 年第 3 期，第 5—8 页。

少子超老龄化等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将对天皇制的存续造成怎样的影响，值得关注。在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吸纳与利用方面，历经战前战后的漫长岁月，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虽已渗透日本社会，但在“和魂汉才”“和魂洋才”的滤镜原则下，还远远未能达到扎根的程度。日本挥舞着并不怎么顺手的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大棒搞所谓“价值观外交”，无异于画地为牢，收效甚微。20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冲击”以及当下的“特朗普冲击”，都令本就对美国猜忌心颇重的日本人焦虑地惊呼“日美同盟难道要消亡了吗”。^①至于对文化软实力的培育与运用，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收效都比较大。首先，日本人对国民文化身份的认同感显著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也显著提升。日本政府2025年1月公布的关于日本人社会意识的最新舆论调查显示，在被问及“你对日本国家及作为日本国民最感到自豪的是什么”时，选择回答“优秀的文化和艺术”的受访者占比高达51.4%，仅次于“良好的治安”（56.3%）以及“美丽的自然”（55.3%），以微弱差距位居第三。^②尤其是与战后初期日本国民认识不清日本文化为何物时的彷徨相比，如此认同率不可谓不高。其次，从日本多年居于“世界最佳国家”排名前列来看，日本对外运用文化软实力的效果也是很大的。^③

进一步而言，无论从战后日本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具体实践来看，还是从当前学界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家文化安全至少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作为受保护对象的文化的的社会安全问题；二是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如何发挥文化的作用问题。关于第一个层面的探讨已经很多，学界甚至已经开始关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护好文化的的社会安全问题。^④关于第二个层面的探讨则有待加强，而日本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具体实践表明其已经在将文化作为维护国家安全手段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概言之，20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国家文化安全观语境下的“文化”更多是被作为保护对象看待的，“文化国家”建设的核心也是如何保护日本文化；自70年代末开始，日本国家文化安全观语境下的“文化”则多被视为“综合安全保障”要素之一，是作为保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来看待的。

（责任编辑：叶琳）

① 永沢毅「日米同盟は消滅しないか」、『日本経済新聞』2025年4月13日。

② 内閣府政府広報室「『社会意識に関する世論調査』の概要」、2025年1月、33頁。

③ 张建立：《试析日本文化软实力资源建设的特点与成效》，《日本学刊》2016年第2期，第124页。

④ 许伟：《数智化背景下国家文化安全的悖论及消解》，《贵州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第50—55页。

directed orientation in both the military utilization of outer space and in space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re visibly intensifying. However, the deepening of U. S. – Japan military collaboration in space has exerted negative impacts on space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has further exacerbated security tensions with China.

The “Dual – Layer Hedging” Strategy of Japanese Semiconductor Firms in the Context of U. S. – China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Wang Chao and Wei Peng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has emerged as both the focal point and the critical arena of U. S. – China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Under intensifying U. S. pressure on allies such as Japan to pursue “de – Sinicization”, semiconductor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nstrument of geopolitical contestation. In this context, Japanese semiconductor firms have adopted a “dual – layer hedging” strategy that combines state and market dimensions, leveraging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to promote the revival of Japan’s semiconductor sector. On the one hand,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y hedge against political risks by aligning with U. S. – Japan governmental regulatory policies, conducting micro – level economic diplomacy with China, introducing key overseas resources, and consolidating domestic industrial foundations, thereby enhancing strategic autonomy on the production side. On the other hand, at the market level, they implement commercial hedging by expanding counter – cyclically into China’s mature – process market while simultaneously cultivating high – end application market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us constructing a diversified configuration on the sales side. Shaped by negative perceptions of “de – Sinicization”, the endogenous impetus of industrial policy, external pull factors, and their relatively weak discursive power within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value chain, Japanese semiconductor enterprises have pursued this “dual – layer hedging” strategy to advance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with Japan as a supply – chain hub, to constrain China’s semiconductor upgrading and national security development, and ultimately to acceler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power structure while expanding the flex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s Efforts to Safeguard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in the Postwar Era

Zhang Jianli

The issue of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has become a prominent topic of concern across disciplines such as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ultural studies,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postwar Japan’s practices of safeguarding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culture” has been treated both as an object requiring protection in line with the times and as an instrument for maintaining national security. This dual characteristic is clearly reflected in several areas, including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imperial institution, the absorption and instrumentalization of Western bourgeois values, and the culti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soft pow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emperor system and the utilization of the imperial family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sustaining Japan’s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enhancing its national image, though the declining number of imperial family members has posed new challenges to the system’s continuity. While Western bourgeois values have gradually permeated Japanese society, the so – called “values diplomacy” has achieved little substantive effect. By contrast, the culti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soft power have proven highly effective, both in boosting domestic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in elevating Japan's national image abroad.

Gen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age Perceptions: A Study of Japanese “Generation Z” Youths’ Favorability toward China

Tian Kai and Zhang Jiaming

The persistent lack of favorable sentiment toward China among the Japanese public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phenomenon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since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nd addressing this issue remains a pressing challenge for fostering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ties. Surveys conducted in Japan indicate that levels of favorability toward China rise as respondents' age decreases, with younger cohorts—particularly “Generation Z”—displaying relatively stronger feelings of affinity toward China. Having grown up in the post-bubble era of relative economic stagnation, Japan's “Generation Z” has not experienced the psychological disillusionment associated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bubble economy. This cohort is characterized by an embrace of individualism and a general detachment from political issues, while simultaneously exhibiting a generational propensity for engagement with mobile internet platforms and social media. In the age of digital connectivity, some politically indifferent members of “Generation Z”, while filtering out Sino-Japanese political disputes, are exposed through online and social media channels to China'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se dynamics are continually shaping circles of high favorability toward China among contemporary Japanese youth. Recognizing and actively fostering this trend of improved perceptions within younger generations may represent a practical pathway toward gradually ameliorating Japanese society's overall attitude toward China.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He Ping and Huang Bei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has undergone four distinct stages—initiation, development, maturity, and deepening—each corresponding to a generational gradient marked by the emergence of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and seminal works, alongside shifts in core research themes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Behind this process of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lie three key factors: the internal disciplinary logic and methodological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apan's academic traditions and scholarly ecology, and the individual preferences and coll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scholars, though their relative influence has varied across different stages.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e exemplary role of pivotal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teams, two-way channel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platforms such as academic associations and journals have provided important practical support for the advancement of quantitative studies. Although the Japa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unity has not experienced intense “great debates” or radical “methodological revolutions” in this field, its sustained phases of reflection and its efforts to balance “local characteristics” with “international mainstreams” nevertheless offer valuable insights.